


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之三十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丛书之六十

西藏志書述略

何金文 编著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编者前言

费了整整三年多的功夫，这套由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上百名图书馆学、目录学专家和地方志专家们通力合作，集体劳动的结晶——《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在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直接支持与具体合作下，其各分册的书稿多已数经编审与修改、即陆续可签付投入印刷了。

承蒙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董一博同志为本丛书题签，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王季平同志、中国地方志专家，前辈学者傅振伦同志为本丛刊撰写了序言，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和有关专家、学者、书法家们分别为丛书各分册写序或题签，或慨然允诺担任本丛书顾问，特别是王季平同志和中共吉林省委副秘书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江涛同志，吉林省文化厅顾问李石常同志，省文化厅厅长吴景春同志和省图书馆顾问王化长同志等对本丛书的编辑出版给予了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这使我们——丛书的编者和各分册的撰稿者倍受鼓舞，大家内心的喜悦之情远非笔墨所能表达，在此，我们对领导和专家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图书馆界多年以来在为读者提供地方志遗产的咨询服务工作中的体会，我们感到对浩如烟海的方志遗产进行分地区的研究，对方志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鉴于绝大部分的方志遗产是藏在图书馆里，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于一九八〇年成立了地方史志研究组，邀请国内各省、市、自治区的有关专家撰写文章，在

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支持下，于一九八一年十月，编辑出版了《中国地方志论丛》。

此后不久，地方史志研究组又提出了将原《中国地方志论丛》的内容加以扩展，使之向具体化、纵深化和有序化的方向再进一步研究、介绍的计划，并立即付诸实施。首先，在原《中国地方志总论》一书基础上，编辑《中国地方志论集》。从我国1911—1983年近百种报刊中收录、选辑有关地方志的论文共六十余篇，分建国前后两册出版，作为本丛书总论部份，书后附有1950—1983年中国地方志论文索引。

其次，在原《中国地方志分论》一书基础上提出《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一度曾题为《中国地方志考评丛书》）主体部分的编辑方案和组稿计划。我们的宗旨是：对全国每一省、市、自治区的方志遗产分别编辑出版专书予以深入、具体的评价和介绍；将我国方志遗产作为一个系统对待，通过整体性和有序性的考评，使这整个文化信息构成大厦的阶梯层次和全面结构轮廓，逐渐呈现在读者面前，供有效地利用。一九八二年五月，我们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有关专家发出倡议，确定了《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各分册的主编及撰稿人。

这一编辑计划得到了全国同行们的积极响应，各分册的主编都真正地尽到了责任，他们或身体力行、全力以赴，或与同仁们鼎力协作。在将本省、市、自治区范围内的全部方志研读一遍的基础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抓住主要特点，评介志书价值，然后撰写成文。根据丛书编辑体例的要求，现在各分册的内容一般皆以该省级现行行政区划辖下的地区、行署、省辖市（州、盟）为单元立题，有多少地区级建置，即写多少篇考评文章。大体上说，每省级下辖的地区级

方志，是以旧府志、州志、厅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同时也未忽略对其属下的县级方志（包括土司所志、山川、寺庙志乃至重要的乡镇志）的研究与介绍。每篇文章字数均从实际出发，材料丰富者多写，单薄者少写，力求用宏取精、爬梳扶剔，使这批科研成果在汇编成册时，在本地的方志宝库与读者利用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起着一种信息媒介的作用。

本丛书是集体努力的成果，在三年多时间内，我们地方志研究组的同志只不过是起了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即使这些微的作用，也未能如愿尽责。由于我们人少力单，学浅闻隘，无论在总体设计还是在每种书稿的编审过程中，力不从心和事与愿违的情况，是比比出现的。加之，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志遗产分布很不平衡，各分册的撰稿者所下功夫或深或浅，难能一致，故丛书的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为此，尚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在本丛书初审稿件时，曾得到北京图书馆徐文绪同志、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谢灼华同志、首都图书馆冯秉文同志、青海图书馆陈超同志、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仇波同志等的关怀和协助，我们愿借丛书的出版来表达感激之情。尤其令我们难忘的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吉林省省长栗又文同志、在他古稀之年任职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期间，一直对编辑本套丛书予以关怀，并多次派他的秘书高甫同志向编委们传达他的具体指示意见。遗憾的是，在丛书编辑过程中，栗老溘然长逝。他身虽永息，遗志人间。我们今天仅以丛书的出版告慰前辈英魂，倘栗老有知，当含笑于九泉了。

一九八五年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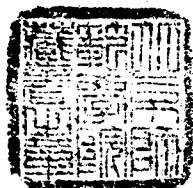
目 录

| | |
|--------------|------|
| 编者前言..... | (1) |
| 西藏方志说..... | (1) |
| 通志类各种典籍..... | (9) |
| 西藏的厅、县志..... | (58) |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200215



1200215

西 藏 方 志 说

西藏自治区的志书，历代纂修不多，迄今所见者，不过十数种，而以“志”名之者，又不过二、三矣。

“西藏”二字之由来，盖始于清圣祖康熙年间。康熙六十年（1721年）的“圣祖仁皇帝御制平定西藏碑文”中，便有“一矢不发，早定西藏”句。清乾隆初期江西峡江县人肖腾麟所撰《西藏闻见录》一书中，开篇便述及此事，其称：“考西藏之载于方輿，即周之西域，汉之西羌，唐之吐蕃也。我朝始分其地为三部，曰‘康’、曰‘卫’、曰‘藏’。而人因其名之实繁，遂总其名而称之曰‘西藏’。”（“事迹”篇）

有关西藏诸事，清雍正以前（1735年以前），或仅见于各种史籍中记载，或仅为出入于藏地者随手记录之“日记”、“纪略”、“纪程”……等，而未见有专门的志书。作为西藏之通志出现者，首推乾隆《西藏志》。书不分卷，纂修者尚无定考。今各家著录多云：“传为果亲王撰”。此乃依据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关中承宣使者和宁（尝官四川布政使，驻藏大臣等）刻《西藏志》的序文中所言，其序称：

“况乎西藏为生佛之地，兴教之方。其山川疆域，风俗程途，尤不可不详其记载也。是书传为果亲王所撰，戊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得自成都抄本，爰付剞劂。”可见当时和宁亦未曾考出此书的真正纂修者，仅能用“传为”

二字以代之。

今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吴丰培先生认为，此志并非果亲王所撰。因为“事迹篇记允礼至泰宁送达赖喇嘛入藏事均提行以示尊崇，且称王不名，更无著者自述语气，自非果亲王所撰。”此其一。又“果亲王……乾隆三年薨”“事迹篇有乾隆”元年章嘉呼图克图（即活佛）自藏入都及“寺庙篇载第四世班禅喇嘛于乾隆六年坐床之事。而《使藏日记》允礼于雍正十三年闰四月朔回京，则乾隆元年之事不相关……由此可证，是书决非允礼所撰。”此其二也。（见1978年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编印的油印本“中国民族资料史地丛刊”之三）。

〔按：果亲王允礼，圣祖第十七子。雍正元年（1723年）封果郡王，六年（1728年）进为亲王，十二年（1734年）命赴泰宁（即打箭炉——今康定县西北之泰宁寺），送达赖喇嘛还藏。循途巡阅诸省驻防及绿营兵，为时约六月。沿途所见记为《使藏日记》二卷（见《清史稿》卷220）〕。

斯志究竟出于谁手，尚待进一步考证。或为当年跟随果亲王使藏者（果亲王实际上仅到达泰宁寺便返回，并未进入西藏。护送达赖喇嘛进藏至拉萨者，乃为副都统福寿，兵部郎中祁山，理藩院郎中拉布坦，四川督标中军副将张圣学等人），据果亲王《使藏日记》，以及此前记述西藏诸事之书如清康熙末期焦应旗撰的《藏程纪略》，吴廷伟撰的《定藏纪程》，杜昌丁撰的《藏行纪程》，稍后一些，即雍正至乾隆初期王我师撰的《藏炉总记》、《藏炉述异记》……毛振翎撰的《西征记》，王世睿撰的《进藏纪程》，张海撰的《西藏记述》……等等，并雍正《四川通志·西城》及其唐、宋、元、明各代史书所载资料编纂而成，而托名果亲王撰，

亦属可能。

在二百年前交通极不发达的情况下，能综合诸家所记，对整个西藏地区作详细的记述，已属难得。且为首创西藏之通志，不能不说它是我国一部宝贵的史地典籍。

其“事迹”篇中，对西藏的古往今来记述较为详尽。开始便称：“西藏一隅，诸鉴多未详载。考其地即西吐蕃也。唐曰‘乌斯国’，明曰‘乌斯藏’，今日‘图伯特’，又曰‘唐古忒’……土人分为三部，曰‘康’、曰‘卫’曰‘藏’。‘康’者即今察木多一路（今昌都地区以东之金沙江两岸），‘卫’者即西藏拉萨台一带（今拉萨市和那曲、山南地区），‘藏’者乃后藏札什隆布一带（今自日喀则以西的整个藏西北高原地区）。”

对于西藏之地理环境，撰者备加赞赏：“居在万峰之中，为西方极胜之区。环山拱合，百泉汇流。自墨竹工卡而下，统召之南西泻，颇得天地之灵脉。布达拉之飞阁层楼，丽色夺目。别蚌、色拉、甘丹、桑鸢四大寺，拱朝于四方。”

“天时”篇称：“平壤则热，高平则冷，有‘十里不同天’之语。”

“物产”篇中，对西藏一地之粮食、蔬菜、牲畜、花果、服物等无不详加记载。甚至连本地原产，外地传入之品种，皆一一考出。

“外蕃”篇称：“西藏定自康熙五十九年……”。

这在“事迹”、“碑文”两篇中均有记载。

“碑文”篇称：“昔者太宗文皇帝之崇德七年〔明毅宗崇祯十五年（1642年）〕，班禅额尔德尼达赖喇嘛固始罕谓东土有圣人出，特遣使自人迹不到之区，经仇敌之国，越数年始达

盛京（今沈阳市）。至今八十载，同行善事……后达赖喇嘛之歿也，弟巴隱匿不奏者十有六年。任意妄行，于藏灭之，复兴黄教……中间策旺阿拉布坦妄生事端，动准噶尔之众，肆行奸诈，灭坏达赖喇嘛，并废第五辈达赖喇嘛之塔。辱蔑班禅，毁坏寺庙，杀戮喇嘛……朕以其所为非法，爰命皇子为大将军，又遣朕子孙等调拨满州蒙古绿旗兵各数万，历烟瘴之地，士马安然而至。”

“事迹”篇亦称：“圣祖仁皇帝……爰命皇子允禔为抚远大将军，统帅六师，驻节西宁，调饷征兵……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夏四月护送达喇嘛自西宁出口进征……秋九月大兵会于藏……月之十五日，送达赖喇嘛坐床。”

另记果亲王至泰宁事云：“雍正十三年（1735年），准噶尔遣使求成，蒙世宗宪皇帝轸念生灵疾劳，允其所请，定界息兵。又以达赖喇嘛久离藏地，令其回召，以遂其性。特命果亲王至泰宁赐以筵宴”。派副都统福寿等人，“领驻防泰宁官兵五百名，于夏四月护送达赖喇嘛同章嘉呼图克图惠远起程，七月望二日抵召，越七日护送达赖喇嘛至布达拉坐床。”

此志书流传至今，题清乾隆五十七年和宁刻本者，仅见湖南省图书馆和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等二、三家。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一部清徐桐活字印本。其余有三、五家收藏清抄本。惟未见清乾隆五十三年和宁得自成都的那一部抄本流落何处。〔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马俊良曾将此志辑入《龙威秘书》之中，作《西藏记》二卷，清口口撰。〕

与此《西藏志》有关联者，为《卫藏通志》一书。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一部清抄本，不分卷，亦不著纂修者姓

名。已故李盛铎先生有一篇跋称：“此当是官撰未成之书，所分六门二十五目，按之亦不尽合，第纂辑较他书为详……”。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袁昶在“刻卫藏通志后序”末称：“校刻此《卫藏通志》二十卷”，并附一按语云：“此书系请前户部主事桂林龙松岑先生继拣校刻，伊未署名，详见先公文集中附记。并云原本未著姓氏，疑即为和琳所辑云。”（和琳，蒙古镶黄旗人，清乾隆末期由兵部侍郎出任驻藏大臣，暨升四川总督，工部尚书。）逾年，袁氏“浙西村舍”照写本刻毕印行时，则标为十六卷首一卷。

在“提要”第二条中称：“旧藏志戊申年得自成都抄本，所载程途、风土、山川颇详，随笔采择，另择分门以记。”这个“戊申”，即与和宁刻《西藏志》序文中所称：“戊申得自成都抄本”的“戊申”（乾隆五十三年）相同。由此可知，此《卫藏通志》中的资料，有很多是采自乾隆《西藏志》。

《卫藏图识》四卷末一卷。马揭、盛绳祖纂修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乃是为了乾隆末期进征西藏，平定噶尔喀（今尼泊尔国）叛乱之军旅所需而纂修的。本书“例言”中便称：“是书所集，只取记载详明，俾从军者便于检阅。”又“是书辑自辛亥（乾隆五十六年）暮冬，匝月付梓”。

书首附有四川酉阳直隶州知州鲁华祝〔江西新城县（今黎川县）进士〕撰的一篇序，中称：“……马君以自打箭炉至唐古忒一隅向无刻本成书，爰同梅溪盛君采《四川通志》中‘西域’一卷及无名氏《西域纪事》、《西藏志》等书，删

其繁者，聚其散者，整齐其错杂者，大旨则折衷于《大清会典》。”可见纂修此《卫藏图识》时，亦把乾隆《西藏志》作为主要的资料来源之一。

此书乾隆原刻本已稀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有一部。而迄今流传较多者，则为清光绪九年（1883年）盛绳祖的后人翻刻的本子。

清乾隆初期，另有肖腾麟氏所撰的《西藏闻见录》一书较有代表性。

肖腾麟，字十州，江西峡江县人，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武举人，五十七年（1718年）武进士。曾任四川北镇（驻今阆中县）左、中、右游击等职，诰受中宪大夫，晋怀远将军。尝领兵驻镇察木多（今昌都县）五年。是书即为肖氏驻察木多时所记、所撰。

书首肖氏自序称：“乾隆二年（1737年），统领官兵驻镇察木多，督理西藏台站也。瓜期当代，时准噶尔奏准进藏熬茶，又以熟悉夷情，留驻二年，盖五载于兹。跋涉所经，风物非一……余驰周旋，凡目之所睹，耳之所闻，躬之践履者，辄笔之于纸，以志不忘。

书分上、下二卷，共二十门。

其中“方语”一门，是迄今所见最早记载汉、藏语音、词汇的一种书。

书末有其子肖锡珀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刊刻是书时撰写的跋文，述及其父撰著此书的经过以及自己刻书之事宜。另附有一篇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清代名人卢文绍撰写的“书后”。

此书原刻印本迄今亦属稀见了。

清代后期纂修的西藏志书，以及有关西藏之著述，尚有松筠撰的《西招图略》，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徐灏撰，《西征日记》，赵咸中撰的《使廓纪略》，许光世，蔡的晋成纂辑的《西藏新志》，以及日本人大田保一郎纂辑的《西藏》，日本陆军步兵大尉山县初男编纂的《西藏通览》……等书。其中以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和《西藏通览》两种最俱特色，最有代表性。前者刊刻于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为官修之书，记述比较全面，内容极为丰富。后者纂成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乃是依据此前各种山县初男所能搜集到的有关西藏之史地典籍辑录、编纂而成，分门颇细，条理清楚，且辑入了清代末期英、俄等帝国主义侵略西藏之史实，以及清代后期进入西藏“探险”之外国人的情况。此二种书迄今流传较多。

到了民国年间，开局纂修《四川通志》时，曾聘请成都人陈观浚纂修《西藏通志》，此为旧方志中纂修得较好的一种西藏通志，类目清析，考证多有见地。书不分卷，共有三十个门类。

然而此通志成书后未能刊行，仅有一部眷清稿本收藏于四川省图书馆。

清德宗光绪以前（1908年以前），未曾正式纂修过西藏各地的县志（因为此前西藏境内并未设置州、厅、县，仅于各地设粮台或粮站，派员管理粮务等事）。仅在清宣宗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李梦皋纂修过《拉萨厅志》二卷，记述甚略。另外，便是清末民初河北人刘赞廷编纂的原属西康地区各县的“图志”。西藏各地设置县治，乃在清宣统二年至民国元年间（1910年——1912年）。“图志”共有

三十七种，其中二十一种今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十六种今属西藏自治区，计为太昭县（今工布江达县）、九族县（今巴青、比如、索县、丁青等县地区）、嘉黎县、昌都县、贡县（今贡觉县）武成县（今并入贡觉县）、察隅县、麦科县（今并入察隅县）、硕督县（今并入洛隆县）、波密县、冬九县（今并入波密县）、同普县（今江达县）、宁静县（今芒康县）、盐井县（今并入芒康县）、定青县（今类乌齐县和丁青县的部分地区）、恩达县（今并入类乌齐县）等。这些“图志”，各县分类不等，有的分十二门，有的分十六门、有的分二十一门。

通志类各种典籍

有关西藏自治区的史地事略，明代以前，仅见于各种史书，如《旧唐书·吐蕃传》、《宋史·吐蕃传》、《明史·西域乌斯藏本传△……等等。其所记又多为史事，而于地理沿革、山川疆域、城池关津、田赋户口、货贝物产等……，所记甚少。明代中、后期纂修的几种《四川总志》中未见有记载。清康熙《四川总志》中也仅于卷三十五“筹边”中云：

“西番即吐番也，其先本羌属，凡百余种，散处河、湟、江、岷间，其酋发、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后有樊兄者，西济河逾，积石居岐布川或逻婆川。隋开皇中，有论赞索者居牂柯西。唐贞观中始通中国。既而灭吐谷浑，尽有其地。”

而以地方志之体例和内容问世者，最早是于清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纂修，越二年成书，而于乾隆元年（1736年）刊刻印行的雍正《四川通志》之中的“西域”一卷。距今二百四十六年了。

其“西域”一卷，为该通志的第二十卷。中称：“我国家声教洋溢，遐迩无遗，如大渡以西，万有余里，威稽颡输诚，岁时入贡，于以见圣朝一道同风之治，为千古莫及。兹列其山川，纪其风土人物，以备职方……”。

所记自打箭炉起（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传为三国时蜀相诸葛亮南征时，遣将郭达安炉造箭于兹，遂得此

名。而《辞海》1979年版第1518页称，实乃为“达折渚”之音讹也。即达、折二水汇流处），一路向西记去，经里塘（今理塘县）、巴塘（今巴塘县）、乍丫（今西藏昌都地区察雅县）、×木多（又作察木多，即今昌都县）、类伍齐（今类乌齐县）、洛隆宗（今洛隆县。宗：这里为藏语，意即寨落或城堡，相当于县级行政区划）、硕般多（洛隆县西，1960年并入洛隆县）、达隆宗（一作宾巴，今边坝县）、拉里（一名喇里，今嘉黎县）、工布江达（今拉萨市工布江达县）等地，一直记到“西藏”（即今拉萨市及其周围地区）。每一地皆各自标目，计为：疆域 津梁 塘铺 山川 古迹 公署 祠庙 寺观 职官 风俗 物产等。惟所记比较简略，仅俱“方志”之雏型。

于“西藏”一地，本书所记云：“在工布江达之西，为图伯特，又称为康、卫、藏。康即今×木多（泛指今昌都地区以及金沙江东岸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地区），卫即今之西藏（指今拉萨市及那曲、山南地区），藏即今之后藏扎什隆布（指今日喀则地区及阿里地区）。”又云：“番民呼为拉撒（即拉萨），乃部民所居之地。”

接着便纪述清代初期平定西藏事略。自清初“颁给达赖喇嘛册宝拉藏千方印一顆”；后准噶尔泽旺阿拉布坦反叛，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九月派各路大兵进剿，平定西藏，送达赖喇嘛上布达拉山（即布达拉宫）大殿坐床（喇嘛教活佛继承仪式称为“坐床”）；雍正二年（1724年）镌立清圣祖“御制平定西藏碑记”；最末记至雍正九年（1731年）封颇罗鼐为贝勒〔颇罗鼐，生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卒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西藏贵族，以平定阿尔（拉）布

坦等叛乱，既后整顿藏政，训练藏军，维护统一，安定藏局等有功，于乾隆四年（1739年）由贝勒进封为郡王。

然后便又依次分疆域、形势、关隘……等门类，逐一叙述。其“形势”门记云：“山高水秀，宛如福地洞天”。“物产”一门，仅记其名称，矿物、植物、动物合在一起，未分别各标小题。于“天异”一门中有云：“日月明晦，雷电震作，较中华无异。少晴霁，多阴雨，夜亦有露，秋终有薄霜。”而“土则”门又记云：乌斯藏田有水旱，土地平衍。活佛及藏王所都。活佛之床处为布达拉，藏王所居为诏。南北袤长四十里，东西延广四、五百里。陆可驰马，中贯河道。水流东南，不甚快急。清波涟漪，澄洳见底。”

对于二百五十年前的拉萨城概貌，本书有记称：“诏内夹河两聚部落，临白水江（即今拉萨河），为藏地之中央，番夷僧俗，商贾杂处，其地广二里许。诏中楼殿衙署，街道马市，井井可观。四围无城廓，就居人所住，碉楼环绕，相联以为藩篱，似中华（指内地）之一大村镇。其余村庄，星罗棋布。外则崇山围绕，隘口险峻，诚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另于“人事”门中记云：“农遇春和水至，耕耘锄耨。水田旱地，各乘时力作……工匠各色皆备，木石工玲珑细腻，丹青累丝尤属奇巧”等。

再后，则附记“自成都府至西藏路程”，分为七个大站，各站皆标出里程。第一站由成都至打箭炉，共一千另二十里。第二站由打箭炉至里塘，共六百另五里。第三站由里塘至巴塘，共三百四十里。第四站由巴塘到瞻对（今新龙县地），共四百二十里。第五站由瞻对至×木多，共四百四十

里。第六站由×木多至喇里（今嘉黎县）共一千二百三十里。第七站由嗽里至嗽撒（即拉萨），共五百三十里。总计四千五百八十五里，（约有五千里）。各大站之间的每小站，亦均列出站名及里程。

最后则为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抚远大将军军允禩的奏章，以及定西将军噶尔弼“平定西藏碑记”、“平定西藏疏”等。

就其体例来说，前已提及，只初具“方志”之雏型，就其内容来说，过于简略，尚不完善。但它比之单独以西藏地方志面貌问世之《西藏志》要早五十一年。《西藏志》在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和宁为之刊刻印行前，也仅仅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在成都得见手抄本。其成书当在乾隆中后期，比此雍正《四川通志·西域》要晚十数年乃至数十年。

下面便介绍乾隆《西藏志》。

和宁，蒙古镶黄旗人，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进士，五十三年（1788年）任四川按察使，五十五年（1790年）升四川布政使，五十九年（1794年）尝以内阁学士侍郎驻藏任事。自著有《西藏赋》一卷。

和宁在其刻《西藏志》的序文中称：“今考西藏志，名其地曰‘拉萨’，其台吉有‘颇罗鼐’者，则知古籍所载曰‘逻娑’，曰‘逻些’（些音娑），曰‘拉萨’，乃译音之近似。曰‘波罗奈斯’，曰‘波罗祭斯’，曰‘颇罗鼐’，又字画之舛讹。总之皆西方佛地也。”又云：“……迨汉明帝夜梦金人，乃发使天竺写致梵经及释迦像，白马驮至中夏，以为寺名……至其方物事迹，微特汉之张骞、甘英遍阅西土，未有成书。即唐之元玄奘法师，游西域十七年，撰记十二卷，率多省略。或亦考古者之遗憾欤！惟我朝